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 精神健康状况^{*}

梁 宏

【内容摘要】近年来,农民工自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该群体精神健康问题的高度关注。由于此类事件的死者多为新生代农民工,那么,是否可以判断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差,或者,不同代际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模式。文章利用2010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了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且,比较了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模式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年龄效应,而是具有明显的世代效应,即通过工厂内、外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来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同时,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也存在很多不同。研究建议,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从世代效应出发去看待他们的问题,促进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关键词】精神健康;代际差异;龄效应;世代效应

【作者简介】梁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广州:510275

Mental Health of Peasant Worker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Liang Hong

Abstract: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2010 Sample Survey of the Research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easan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conducted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paper examine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mental health of peas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n mental health of peasant workers by comparing the new generation with the ol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n mental health of peasant workers involves major cohort effect in addition to age effect. F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 workplace and social psycholog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peasant workers, which are appare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ife course and cohort effect perspectives are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to deal with issues related to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or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ies.

Keywords: Mental Health,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Age Effect, Cohort Effect

Author: Liang H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Email: sysulh@163.com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09JZD0032)”的资助。

1 问题的提出及理论视角

1.1 问题的提出

自2010年1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陆续跳楼自杀事件开始,农民工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年5月,由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组织的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富士康进行了调查;在民间,从传媒到社会团体,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农民工自杀事件进行着反思与讨论,同时引起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高度关注。

回顾此类自杀事件可以发现,死(伤)者多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①。那么,是否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差,或者说,精神健康状况较差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对农民工而言,“新生代”既是他们年龄较轻的个人特征,又是他们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体特征。那么,在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中,是年龄这个个人因素在发挥作用,还是出生队列这个群体因素在发挥作用?即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个体效应还是群体效应;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同时,作为群体因素的出生队列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通过哪些因素实现的,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不同代际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式存在怎样的差别?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了解代际差异与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还能帮助我们掌握代际因素在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模式中的作用方式,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

1.2 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代际差异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巨变时代中,两代人之间对社会巨变所持的不同看法,会导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矛盾甚至冲突。从人口学角度来看,通常讲的“代际差异”蕴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属于个人特征且与生命周期高度相关联的年龄层差异,即年龄效应(age effect);二是属于群体特征且与生命历程高度关联的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

生命历程大体是指在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它的分析框架包括了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社会模式的代际传承,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命史的影响(李强,1999)。其中,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命史的影响往往在世代效应中得以体现。根据人口学理论(佟新,2000),同一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可以看作一个队列(cohort,也叫同期群),他们经历着相同的历史事件,是一组具有相同社会时代背景的人口。世代效应是将人口与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当社会变迁对不同世代的队列产生不同影响时,由于相同世代人口群体的经历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不同世代人口的境遇往往具有很大差异,因此,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从不同人口世代(即队列或同期群)在所具有的不同经历中表现出来。

本文在生命历程的理论背景下,将代际差异具体化为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来分析它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影响。由于代际差异的影响中既包含着体现个体特征的年龄效应,又包含着体现群体特征的世代效应,因此,将两种效应从代际差异的影响中分离出来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年龄层被定义为个人特征,它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是直接的,即作为个人特征的年龄效应是一种直接效应。根据世代效应理论,相同世代的人具有相似的经历、机遇甚至价值观,而不同世代的人的境遇往往具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世代因素可能通过环境、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来影响行动者,使

^①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6502663.html?fr=qrl&cid=204&index=1&fr2=query>;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6502663.html?fr=qrl&cid=204&index=1&fr2=query>; <http://news.163.com/10/0521/08/676PPR7G000146BC.html>。

不同世代的人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体现。代际差异中的世代效应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应该通过其他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来实现,即反映群体特征的世代效应是一种间接效应。如果世代效应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通过哪些因素及途径实现的,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等相关问题也就有了答案;而且,通过不同代际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模型的建立,二者精神健康状况影响模式的差异问题也能得以回答。

2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2.1 相关研究综述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员工精神健康的因素遍及工作场所内外,包括个人特征、组织结构、雇佣期限、工作场所的暴力和虐待、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等(郑广怀,2010),其研究领域涉及心理学、社会医学、社会学等。在心理学领域,对外来劳动力精神健康状况的分析侧重于个人因素和工作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收入、身体健康状况、朋友关系、工种、压力经验等都会影响外来工的精神健康(Wong et al.,2008;Li et al.,2007);工作场所的暴力及虐待(Mkandawire-Valhmu,2010)以及由工作要求、工作控制、组织公平和体力工作压力等几个方面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工作条件(Laaksonen et al.,2006)也会影响员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包括社会医学在内的社会学研究,则将压力、反应等看作中间变量,侧重从规范的社会安排出发来分析影响个人情感领域的社会因素(Aneshensel et al.,1991)。郑广怀(2010)将社会学对精神失调的解释总结为如下四种:一是作为异常行为的精神失调;二是作为心智过程的精神失调;三是作为社会构造的精神失调;四是作为“社会框架”(Rosenberg,1992)产物的精神失调,并论述了劳动权益被侵犯、工厂体制、工会的特殊地位以及流动的劳动力体制对员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

从研究层次来看,在以往关于精神健康状况研究的心理学、社会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虽然从微观的个人特征到宏观制度(郑广怀,2010),结构因素制度都被作为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和研究,但是,研究对象(即员工或农民工)始终是微观的行动者。或者说,以往研究关注的是精神健康状况的个体特征及影响因素,而没有从群体层面研究世代效应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没有细致分析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代际差异。

从研究视角来看,以往研究关注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即充分地分析了流动压力、社会支持、人生事件及应对方式、自身和劳动权益状况等因素的作用(何雪松,2010;Snow et al.,2003;Wong & Leung,2008),并基本建立起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但是,这些研究多立足于静态的因果分析,而较少考虑生命历程中的动态因素对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此,目前鲜有研究探讨代际差异与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很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尚无定论。比如,代际因素作为个人特征独立作用于精神健康状况,还是作为群体的世代效应通过其他影响因素对精神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在不同代际的农民工中,以往研究中的各种因素对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式是否会发生改变,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研究领域的焦点。代际差异不仅是个人特征,它还承载着一代人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命历程的群体特征。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区分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来研究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探讨代际因素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作用模式,并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及模式进行对比。

2.2 研究框架与实证假设

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采用截面调查数据,因此本文只能通过划分不同的年龄组(即代际)来研究世代效应;但是,年龄组不仅体现着世代差异,还体现着作为个体生命周期特征的年龄差异。由于世代

效应体现了不同代际人口所经历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可以通过其他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来实现其影响,因此,本文分别通过年龄组(即代际)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检验代际差异的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具体来说,虽然作为代际差异测量的年龄组变量具有年龄层和世代的双重含义,但是,通过前文对两种效应的理论分析,可以将年龄组变量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直接影响界定为年龄效应,将年龄组变量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间接影响界定为世代效应^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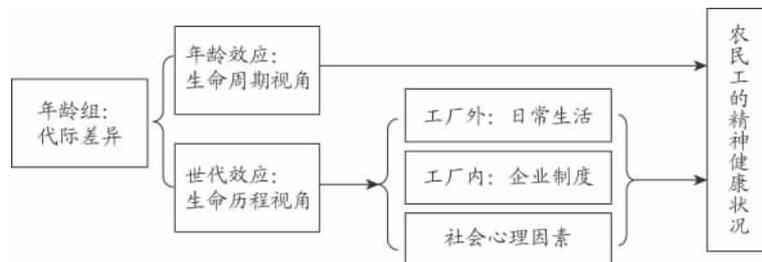
基于以往研究及农民工问题的不同的解释框架,本文建立了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的框架图(如图1)。其中,由年龄组变量操作化测量的代际差异中的世代效应将通过工厂外的日常生活状况、工厂内的企业制度等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来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而其中的年龄效应将类似于个人特征而直接作用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

由于以往研究尚未发现代际因素对精神健康状况的独立的显著作用,因此,本文首先假定:作为个人特征的代际因素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即代际差异的年龄效应不存在。由于本文研究针对作为个人特征的代际差异的年龄效应,而不是年龄因素本身的影响,并且,本文将农民工按照代际特征划分为老一代和新一代两个年龄组,因此假定:年龄组变量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假设1)^②。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世代效应体现着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人生经历的差异,因此,本文通过建立代际因素与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来检验世代效应是否存在,具体来说,本文将通过检验年龄组与农民工生产、生活、心理状态的交互作用项即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来回答世代效应是否存在,同时,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世代效应通过哪些因素作用于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因此假定:作为群体特征的代际因素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影响,即代际差异的世代效应存在;具体来说,体现世代效应的年龄组会通过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如消费支出)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假设2);体现世代效应的年龄组会通过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如企业性质)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假设3);体现世代效应的年龄组会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如主观剥夺感、对打工城市的评价)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假设4)。

图1 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的研究框架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eas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① 当然,只有当年龄组变量不具有年龄效应,即直接效应不显著时,而它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项即间接效应显著时,才能认为世代效应确实存在;否则,基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仍然不能从显著的交互作用项即间接效应中区分出年龄组变量的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

② 对于年龄本身所具有的年龄效应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因此,年龄变量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显著性暂不讨论。

3 变量与测量

本文利用 2010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外来工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此次调查^①”)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了解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即其中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而非研究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因此,笔者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及本文的研究框架,选择了问卷中与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相关的指标。

3.1 因变量:精神健康指数

此次调查通过 GHQ-12 精神健康量表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了解,为了突出反映农民工群体负面的心理状态,本文只分析“因担忧而失眠”、“总是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克服困难”、“觉得心情不愉快和情绪低落”、“对自己失去信心”、“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六项精神健康状况。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全体农民工的上述六方面的信度系数(alpha)高达 0.7435,其中,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上述六方面的信度系数皆较高,分别为 0.7331 和 0.7567。在模型分析中,将上述六项出现的频率即完全没有、与平时一样多、比平时多一些、比平时多很多分别赋值为 4、3、2、1,然后加总构造成精神健康指数。该指数值越高,表示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

3.2 自变量

(1) 代际因素:年龄组

本文对农民工的代际划分与以往研究一致,即 1980 年之后出生的、具有农业户口(或由于城市化原因而“农转非”)的、并且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年龄组,将 1980 年 1 月之前出生的农民工定义老一代年龄组。

(2) 日常生活因素

日常生活因素包括收支比(每月支出除以目前月平均工资)、居住关系(分为与亲人或恋人合租、与其他人合租两类)。

(3) 企业制度因素

通过对农民工所在企业的性质(分为国有、集体或股份制、私企、外资或合资、个体或其他四类)、工作种类(分为工人、中低层管理者、服务销售人员三类)、企业中工会组织的存在与否、劳动合同的有无、每周上班天数等进行测量来反映企业制度。

(4) 心理状态因素

农民工的主观意愿、评价和认同状况反映着他们的心理状态,对此,本文选取剥夺感、加班意愿、对打工城市的评价和身份认同四个方面来测量农民工的心理状态。具体来说,将“我不属于这里(打工的地方)”、“我受到了老板的剥削”、“这个社会很不公平”、“我的收入没有体现我的劳动价值”、“城市人(本地人)很排斥我们外来打工者”、“我在城市里低人一等”六种感觉出现的频率即从来没有、偶尔有、经常有、总是有、说不清分别赋值为 0、2、4、6、1,然后加总得到主观剥夺感指数,该得分越高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剥夺感越强。同时,将是否自愿加班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超时工作意愿及其对企业工作制度的认同程度。将所在打工城市的就业水平、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社会治安、交通条件、子女教育质量、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公正、生态环境等十二方面的评价分数加总,得到打工城市评价指数,该分值越高表示评价越好。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区分为农民、个人和说不清三类。

^① 关于此次调查的样本情况、调查结果说明,请参见《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2 期。

(5) 控制变量:个人特征

本文将性别、年龄、工龄^①、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②、是否有过换工经历、所在地区(“珠三角”或“长三角”)作为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的统计分布情况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变量值	新生代 比例(%)	老一代 比例(%)	全体 比例(%)
性别	男	49.85	61.12	54.50
健康状况	不好	5.36	7.20	6.12
	一般	31.04	32.12	31.49
	比较好	40.94	39.53	40.35
	非常好	22.66	21.16	22.04
换工经历	有	67.52	67.88	67.67
居住地区	长三角	41.54	44.04	47.49
	珠三角	58.46	55.96	52.51
和谁居住	亲人或恋人	41.01	73.25	54.32
	其他人	58.99	26.75	45.68
企业性质	国有集体/股份	16.54	19.44	17.74
	私企	54.83	56.28	55.43
	外资或合资	23.72	17.22	21.24
	个体或其他	4.91	6.55	5.59
工种	工人	37.54	42.00	39.38
	中低层管理者	41.84	38.56	40.49
	服务销售人员	20.62	19.44	20.13
企业工会组织	有	22.51	26.21	24.04
劳动合同	有	74.62	71.43	73.30
是否自愿加班	是	57.25	66.38	61.02
身份认同	农民	20.54	38.88	28.12
	工人	52.64	42.75	48.56
	说不清	26.81	18.37	23.33
	代际因素	新生代	—	—
	老一代	—	—	41.29
变量	变量值	新生代 均值(标准误)	老一代 均值(标准误)	全体 均值(标准误)
精神健康状况得分	—	20.15(2.78)	20.84(2.68)	20.61(2.75)
年龄(岁)	—	23.49(3.59)	38.99(6.28)	29.89(9.06)
工龄(年)	—	5.13(3.49)	12.55(6.78)	8.19(6.28)
受教育年限(年)	—	10.11(2.73)	8.20(2.55)	9.32(2.81)
目前工资(百元)	—	7.51(0.34)	7.53(0.40)	7.52(0.37)
人均月消费(百元)	—	6.72(0.54)	6.55(0.56)	6.65(0.55)
每周上班天数	—	5.95(0.79)	6.17(0.79)	6.04(0.80)
剥夺感强度得分	—	8.55(6.27)	9.37(6.96)	8.89(6.58)
对打工城市评价得分	—	25.46(7.92)	27.59(7.79)	26.34(7.94)

① 本文用农民工在城市第一份工作的起始时间到调查时点的时间长度作为“工龄”的近似测量。

②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技校)、中专、大专、自考本科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5年、8年、11年、12年、15年、16年。由于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问卷填答中,一部分未完成小学、初中或高中教育者却分别填答为小学、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因此,本文对受教育年限的赋值略低于其他研究。

4 分析结果

4.1 不同代际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比较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明显较差。具体来说,最近两周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因担忧而失眠、总是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克服困难、觉得心情不愉快或情绪低落、对自己失去信心、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等不健康精神状况的发生比平时多的比例分别比老一代农民工高3.78、5.23、3.48、3.65、1.91、0.46个百分点;并且,两代农民工的各种负面情绪的发生频率都具有显著差异。

从精神健康状况指数得分差异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得分(均值为20.15,标准差为2.78)也显著地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均值为20.84,标准差为2.68)。如果说,工作压力大、缺乏归属感等原因会对农民工的精神状况造成负面影响,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更需要快速了解、深入关注。

表2 不同代际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比较

近两周的精神状况	农民工类别	完全没有	与平时一样多	比平时多一些	比平时多很多	合计	有效样本量	差异检验卡方值
因担忧而失眠	新生代	55.49	29.17	13.49	1.85	100	2379	12.45***
	老一代	58.58	29.86	10.14	1.42	100	1765	
	合计	56.81	29.46	12.07	1.67	100	4144	
总是感到有压力	新生代	29.06	46.33	21.88	2.73	100	2381	32.20****
	老一代	36.37	44.25	16.60	2.78	100	1765	
	合计	32.18	45.44	19.63	2.75	100	4146	
觉得不能克服困难	新生代	54.14	36.39	8.41	1.05	100	2377	17.76***
	老一代	57.23	36.79	5.13	0.85	100	1756	
	合计	55.46	36.56	7.02	0.97	100	4133	
觉得心情不愉快或情绪低落	新生代	44.96	42.18	11.13	1.73	100	2371	29.69****
	老一代	52.87	37.92	7.85	1.36	100	1759	
	合计	48.33	40.36	9.73	1.57	100	4130	
对自己失去信心	新生代	71.52	23.05	4.42	1.01	100	2377	8.83*
	老一代	73.28	32.20	2.72	0.80	100	1763	
	合计	72.27	23.12	3.70	0.91	100	4140	
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新生代	79.68	17.13	2.64	0.55	100	2382	16.55****
	老一代	75.88	21.40	1.82	0.91	100	1762	
	合计	78.06	18.94	2.29	0.70	100	4144	

4.2 代际因素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的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以及世代效应通过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机制(见表3)。

4.2.1 模型的总体情况

在分析代际差异的作用之前,本文首先考察了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因素、企业制度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对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见表3模型1)。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受诸多因素影响。在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中,每月支出越多,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差,这可能与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普遍偏低有关,高支出意味着低积累,进而造成精神紧张;与和亲人居住在一起的农民工相比,与其他人居住的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较差。在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中,劳动权益状况是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显著因素,即每周上班天数越多,精神健康状况越差;而诸如企业性质、工作种类等的制度安排与福利安排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社会心理因素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比较大,与不自愿加班相比,自愿加班的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明显更好;主观剥夺感越强精神健康状况越差;对打工城市评价越高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与自认为农民相比,身份认同为工人的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更好。个人特征中(不包括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自评与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关联度很高,即身体健康状况自评越好的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也越好;男性的精神健康状况好于女性;此外,换工经历、地区分布以及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

表3 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easant Workers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a (男)	0.24*	0.11	0.19	0.11	0.21	0.11	0.21	0.11
年龄			0.12**	0.04				
年龄平方项			-0.002**	0.001				
受教育年限	-0.03	0.02	-0.03	0.02	-0.03	0.02	-0.02	0.02
身体健康 ^b :								
一般	0.69**	0.24	0.69**	0.24	0.70**	0.24	0.70**	0.24
比较好	1.18***	0.23	1.20***	0.23	1.20***	0.23	1.20***	0.23
非常好	1.44***	0.25	1.47***	0.25	1.46***	0.25	1.44***	0.25
换工经历 ^c (有)	-0.20	0.11	-0.24*	0.11	-0.20	0.11	-0.18	0.11
地区 ^d (长三角)	0.004	0.12	-0.01	0.12	-0.01	0.12	-0.02	0.12
对数收支比	-0.31**	0.1	-0.29**	0.10	-0.29**	0.10	-0.04	0.15
和谁居住 ^e (其他人)	-0.41***	0.11	-0.30*	0.12	-0.36**	0.12	-0.40*	0.19
企业性质 ^f :								
私企	0.25	0.15	0.23	0.15	0.26	0.15	-0.08	0.22
外资或合资	-0.05	0.17	-0.05	0.17	-0.04	0.17	-0.33	0.28
个体或其他	0.43	0.26	0.43	0.26	0.44	0.26	-0.37	0.38
工种 ^g :								
中低层管理者	0.12	0.13	0.09	0.13	0.11	0.13	0.06	0.19
服务销售人员	0.24	0.15	0.25	0.15	0.23	0.15	0.25	0.23
企业工会组织 ^h (有)	-0.001	0.14	-0.04	0.14	-0.01	0.14	-0.22	0.21
劳动合同 ⁱ (有)	0.15	0.13	0.11	0.13	0.15	0.13	0.10	0.2
每周上班天数	-0.16*	0.07	-0.15*	0.07	-0.16*	0.07	-0.03	0.11
是否自愿加班 ^j (是)	0.63***	0.11	0.61***	0.11	0.61***	0.11	0.67***	0.18
主观剥夺感的强度得分	-0.10***	0.01	-0.10***	0.01	-0.10***	0.01	-0.07***	0.01
对打工城市的评分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5***	0.01

续表 3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身份认同 ^k :								
工人	0.26*	0.13	0.29*	0.13	0.29*	0.13	0.39*	0.19
说不清	0.02	0.15	0.04	0.15	0.04	0.15	0.16	0.23
年龄组(新生代)					-0.20	0.12		
年龄组*对数收支比							-0.45*	0.2
年龄组*和谁居住(亲人或恋人)							-0.04	0.24
年龄组*和谁居住(其他人)							-	
年龄组*企业性质:							-1.52**	0.52
(新生代)国有集体股份公司								
(新生代)私企							-0.86	0.47
(新生代)外资或合资							-0.97*	0.53
(新生代)个体或其他							-	
年龄组*工种:								
(新生代)工人							3.90**	1.25
(新生代)中低层管理者							3.97**	1.25
(新生代)服务销售人员							3.84**	1.24
年龄组*企业工会组织:(新生代)无							-0.39	0.27
(新生代)有							-	
年龄组*劳动合同:(新生代)无							-	
(新生代)有							0.10	0.26
年龄组*每周上班天数							-0.24*	0.15
年龄组*是否自愿加班:(新生代)否							-	
(新生代)是							-0.10	0.23
年龄组*主观剥夺感的强度得分							-0.05**	0.02
年龄组*对打工城市的评分							-0.05**	0.01
年龄组*身份认同:新生代(农民)							-	
(新生代)工人							-0.17	0.26
(新生代)说不清							-0.19	0.31
常数项	20.17***	0.64	18.18***	0.90	20.27***	0.65	18.94***	0.95
模型整体检验 F 值	20.06***		20.72***		21.24***		13.77***	
确定系数(%)	17.64		18.01		17.74		18.87	
调整后的确定系数(%)	16.84		17.14		16.91		17.50	
有效样本量	2289		2289		2289		2289	

注:(1)a. 自变量的参照类说明:性别的参照类是“女性”;b. 身体健康状况的参照类为“不好”;c. 换工经历的参照类为“没换过”;d. 地区的参照类为“珠三角”;e. 和谁居住的参照类为“亲人或恋人”;f. 企业性质的参照类为“国有集体·股份公司”;g. 工种的参照类为“工人”;h. 企业工会组织的参照类为“非确定存在”;i. 劳动合同的参照类为“非确定签订”;j. 是否自愿加班的参照类为“否”;k. 身份认同的参照类为“农民”(2)目前收支比为明显右偏分布,故取其对数进行分布的正态化处理。(3)*表示显著性 $P < 0.05$,**表示显著性 $P < 0.01$,***表示显著性 $P < 0.001$ 。(4)“-”表示由于多重共线性,系统自动剔除的变量的系数。

4.2.2 年龄效应分析

在上述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加入年龄变量(见表3模型2)。结果显示,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即年龄越大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并且,年龄平方的作用(年龄对结果的倒“U”型作用)显著,即到达一定年龄以后,随着年龄的提高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有越来越差的

趋势。模型 1 与模型 2 比较来看,年龄因素的加入没有改变其他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并且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显著影响是否意味着作为个人特征的代际差异也具有显著的解釋力?或者说,代际差异的年龄效应是否因年龄变量的显著性而存在呢?为了探讨代际差异的年龄效应,本文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年龄组变量(见表 3 模型 3)。结果显示,年龄组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指数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模型的解釋也几乎没有明显提高。可以说,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作为个人特征的年龄组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即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的年龄效应不存在,研究假设 1 得到证实。

虽然前述的描述性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较差,但是,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不显著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差(表 3 模型 3 中的年龄组因素不显著);也就是说,在相同的环境、制度、社会结构以及心理状态条件下,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没有直接影响,其所承载的年龄效应不存在,“新生代”作为个人特征不会加剧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恶化。

4.2.3 世代效应分析

既然精神健康状况较差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独具的个人特征,那么,为何此次调查结果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都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进一步检验这种代际差异所具有的世代效应,即检验年龄组变量与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交互项的显著性(见表 3 模型 4)。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支出、所在企业性质、工种、主观剥夺感的强度、给打工城市的评分对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显著地不同于这些变量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具体来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即使每月支出相同,即使同在国有、集体企业、股份公司或者外资合资单位,即使同为工人、中低层管理者、服务销售人员,即使主观剥夺感相同,即使对打工城市的评分相同,新一代农民的精神健康状况也会较差。分析结果同时显示,模型 4 的解釋力较模型 2 有明显提高,可以认为,交互作用项具有较高的解釋力,年龄组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的世代效应显著存在。

虽然并非所有的交互作用项都显著,但是,仍然可以肯定代际差异所体现的世代效应明显存在;研究结果同时说明,世代效应是通过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企业性质、工种)、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如消费支出)、社会心理因素(如主观剥夺感、对打工城市的评价)来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研究假设 2、3、4 得到证实。

4.3 不同代际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比较分析

如前所述,通过年龄组测量的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不具有显著的年龄效应(即直接效应),而是具有显著的世代效应(即间接效应),那么,在这种世代效应的作用下,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式是否会发生改变,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对两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别建模,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如下(见表 4):

首先,比较发现,表 4 模型 1(或模型 2)的确定系数比模型 3(或模型 4)的高出 2 个多百分点;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也明显较多。可以说,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解釋力明显较高。

其次,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即各因素对新、老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式存在差异。比如,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如每月支出、居住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状况有显著影响,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月支出越多精神健康状况越差,与亲人

在一起居住则精神健康状况更好;但是,这些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模型中看不到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显著作用。并且,在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如企业性质与每周上班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明显较强,即相对国有集体股份公司而言,在私有企业、个体或其他类型企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更好,每周上班天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差;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精神状况都没有显著影响。在社会心理因素中,虽然是否自愿加班与主观剥夺感的强度对新、老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对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能够产生显著影响的心理状态因素较多,对打工城市评价越高的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与农民的身份认同相比,自认为是工人的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更好,而这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都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年龄及工龄因素对新、老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明显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年龄越大精神健康状况越好,而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则刚好相反,即年龄越大精神健康状况越差。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即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越好,并且,从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比较可以发现,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解释略微高于年龄;而工龄对老一代农民工没有显著影响,或者说,老一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与其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没有关系。

任远(2006)对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居留模式分析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时间也越长。该研究结果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选择性,即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更可能留下来,使居留时间不断延长,而不适合的则更倾向于离开。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以及回忆性偏差的存在,调查中很难准确搜集到他们在城市居留时间或工作时间的资料,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较轻,对于流动经历的记忆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好,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工龄可以近似看作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生活的时间长度^①,它的显著作用可以看作是城市生活、工作的适应情况对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

表 4 两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比较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easant Workers of the Two Cohorts

自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a (男)	0.38	0.15	0.40 ^{**}	0.14	-0.09	0.18	-0.16	0.18
年龄	0.05 [*]	0.02			-0.03 [*]	0.01		
工龄			0.05 [*]	0.02			0.01	0.01
受教育年限	-0.001	0.03	0.02	0.03	-0.06	0.04	-0.05	0.04
身体健康 ^b :								
一般	0.47	0.33	0.46	0.33	1.01 ^{**}	0.34	0.99 ^{**}	0.34
比较好	0.99 ^{**}	0.32	0.98 ^{**}	0.32	1.46 ^{***}	0.34	1.43 ^{***}	0.34
非常好	1.34 ^{***}	0.34	1.32 ^{***}	0.34	1.55 ^{***}	0.36	1.52 ^{***}	0.36

① 由于记忆的偏差以及流动过程的复杂性,按照本文操作化定义的“工龄”很难对老一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时间做出准确估计,因此,工龄对全部农民工及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作用也不做深入分析。

续表 4

自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换工经历 ^c (有)	-0.33 [*]	0.15	-0.39 [*]	0.16	-0.04	0.18	-0.06	0.19
地区 ^d (长三角)	-0.14	0.16	-0.15	0.16	0.13	0.18	0.14	0.18
对数收支比	-0.48 ^{**}	0.14	-0.47 ^{**}	0.14	-0.09	0.15	-0.07	0.15
和谁居住 ^e (其他人)	-0.33 [*]	0.15	-0.32 [*]	0.15	-0.26	0.20	-0.26	0.20
企业性质 ^f :								
私企	0.58 ^{**}	0.20	0.58 ^{**}	0.20	-0.16	0.22	-0.09	0.22
外资或合资	0.23	0.22	0.23	0.22	-0.39	0.28	-0.32	0.28
个体或其他	1.14 ^{**}	0.36	1.14 ^{**}	0.36	-0.43	0.38	-0.42	0.38
工种 ^g :								
中低层管理者	0.02	0.17	0.01	0.17	0.13	0.19	0.15	0.19
服务销售人员	0.10	0.20	0.10	0.20	0.40	0.23	0.33	0.23
企业工会组织 ^h (有)	0.12	0.18	0.11	0.18	-0.21	0.21	-0.21	0.21
劳动合同 ⁱ (有)	0.16	0.17	0.15	0.17	0.09	0.20	0.12	0.20
每周上班天数	-0.26 ^{**}	0.10	-0.26 ^{**}	0.10	-0.01	0.11	-0.03	0.11
是否自愿加班 ^j (是)	0.57 ^{***}	0.15	0.58 ^{***}	0.15	0.65 ^{***}	0.18	0.65 ^{***}	0.18
主观剥夺感的强度得分	-0.13 ^{***}	0.01	-0.12 ^{***}	0.01	-0.07 ^{***}	0.01	-0.07 ^{***}	0.01
对打工城市的评分	0.004	0.01	0.01	0.01	0.05 ^{***}	0.01	0.05 ^{***}	0.01
身份认同 ^k :								
工人	0.24	0.19	0.22	0.19	0.37 [*]	0.18	0.39 [*]	0.18
说不清	-0.01	0.21	-0.03	0.21	0.16	0.23	0.19	0.23
常数项	19.93 ^{***}	0.96	20.60 ^{***}	0.85	20.02 ^{***}	1.13	18.79 ^{***}	1.01
模型整体检验 F 值	14.44 ^{***}		14.45 ^{***}		8.89 ^{***}		8.65 ^{***}	
确定系数 (%)	20.16		20.18		18.08		17.69	
调整后的确定系数 (%)	18.76		18.78		16.05		15.64	
有效样本量	1339		1339		950		950	

注: (1) a. 自变量的参照类说明: 性别的参照类是“女性”; b. 身体健康状况的参照类为“不好”; c. 换工经历的参照类为“没换过”; d. 地区的参照类为“珠三角”; e. 和谁居住的参照类为“亲人或恋人”; f. 企业性质的参照类为“国有集体·股份公司”; g. 工种的参照类为“工人”; h. 企业工会组织的参照类为“非确定存在”; i. 劳动合同的参照类为“非确定签订”; j. 是否自愿加班的参照类为“否”; k. 身份认同的参照类为“农民” (2) 目前工资、每月支持为明显右偏分布, 故取其对数进行分布的正态化处理。 (3) * 表示显著性 $P < 0.05$, ** 表示显著性 $P < 0.01$, *** 表示显著性 $P < 0.001$ 。 (4) 年龄平方项对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指数均无显著影响, 置于模型中反而会与年龄变量发生共线性而导致二者均不显著, 故而模型中不纳入年龄平方项; 在新生代农民工模型中, 工龄与年龄高度相关, 共同置于模型中会发生共线性而导致二者均不显著, 故而将二者分别纳入不同的模型。

5 总结与思考

学界研究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理论和观点为本文建立了基本模型,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利用实证数据分析了代际差异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并且对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 代际差异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是以个人特征为主的年龄效应, 而是以群体特征为主的世代效应; 换言之, 代际差异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是直接的, 而是在相同的环境或条件下, 通过工厂外的日常生活因素、工厂内的企业制度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来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间接效应。同时, 工厂内、外及社会心理因素对新生代与老一代

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

代际因素作为世代效应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中的影响启示我们要从群体特征及生命历程视角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我们建议:

首先,注重农民工问题的世代效应。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问题时,不要仅仅将“新生代”作为他们的个人特征,还要将他们看作具有共同世代背景的群体,将问题置于“新生代”所具有的共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加以理解。

其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背景和人生经历。从工龄、换工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独特影响中可以发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与其人生经历的关联度更高,因此,在分析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时,要充分考虑个体的生命历程。另外,在以后新生代农民工数据的搜集中,要重视个人背景、人生经历这些回顾性调查问题的设置,完善的生命历程数据资料必然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发生机制研究,有助于得到更加科学、可靠的因果分析结论。

最后,在城市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政策中,要重视有关加强群体稳定性的政策与措施,做到有序引导、有效服务,减少新生代农民工不必要的流动,推进他们的社会融入进程。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正向显著作用已说明,长久的居住、工作有助于他们精神健康水平的提高,这足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时间越长,心理上的社会适应就会越强,这种适应不仅有利于群体的精神健康,还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李强. 生命的历程.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Li Qiang. The Course of Life.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2 佟新. 人口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Tong Xin. Sociology of Popul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 郑广怀. 迈向对员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学解释. 社会学研究,2010;6:201-220
Zheng Guanghuai. 2010.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Employee's Mental Health. Sociological Studies 6:201-222.
- 4 Wong F. K. D., Y. L. Chang & X. S. He. 2007.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Living a Marginalised Life. 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 16.
- 5 Li J., H. Wang, X. Ye, M. Jiang, Q. Lou & T. Hesketh. 2007.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hines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Comparison with Permanent Urban and Rural Dweller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2.
- 6 Mkandawire-Valhmu J. 2010. 'Suffering in Thought': An Analysis of the Mental Health Needs of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Living with Violence in Malawi.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31.
- 7 Laaksone M., O. Rahkonen P., Martikainen & E. Lahelma. 2006. Associations of Psychosocial Working Conditions with Self-rated Gener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Municipal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79.
- 8 Aneshensel C. S., C. M. Rutter & P. A. Lachenbruch. 1991. Social Structur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Competing Conceptual and Analytic Mode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 9 Rosenberg C. E. 1992. Introduction. In C. E. Rosenberg & J. Gooden (eds.), Framing Diseases: Studies on Cultural Histor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0 何雪松,黄富强,曾守锤. 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2010;1:111-129
He Xuesong, Wong Fu Kung and Zeng Shouchui. 2010.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Shanghai. Sociological Studies 1:111-129.

- 11 Snow ,D. L. ,S. C. Swan ,C. A. Raghavan ,C. M. Connell & I. Klein. 2003.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 Stressor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to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mong Female Secretarial Employees. *Work & Stress* 3.
- 12 Wong ,F. K. D. & G. Leung. 2008.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Male and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Health & Social Work* 4.
- 13 刘林平 ,郑广怀 ,孙中伟 . 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 *社会学研究* , 2011 ;4:164-184
Liu Linping ,Zheng Guanghuai and Sun Zhongwei. 2011. Labor Rights and Mental Health: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Sociological Studies* 4:164-184.
- 14 任远 .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 *中国人口科学* 2006 ;3 :67-72
Ren Yuan. 2006. Gradual Precipitation and Residence-induced Long Term Residence: Analysis on Floating Population' s Residence Pattern in Shanghai.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6:67-72.

(责任编辑:宋 严 收稿时间:2014 -03)